



高先生作诗神思敏捷，引诗如呼吸自如。

袁可嘉
1921.9.18

2014年11月8日，是中国“九叶派”诗人、翻译家和文学理论家袁可嘉逝世6周年的纪念日。来甬参加“宁波文学周”活动的《诗探索》主编、著名诗人林莽捧读第二天即将首发的《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后，夜不能寐。第二天，他在一张便笺上写下这样的诗句：

“斯人可嘉，/是一本书的名字。/他的人生与功绩/如一股温馨的风，/无声地吹透了广袤的土地……/斯人可嘉，/生命的烛火熠熠地燃烧，/我曾受惠于它至美而宁静的风。”

袁可嘉，1921年9月出生于慈溪。在中国文学史上，他很少像活跃在一线、盛名的作家被人太多地提及，这也许源于袁可嘉所从事的诗歌创

作与文学编译、批评工作不为圈外人特别是大众所知，更由于袁可嘉本人的谦逊、低调。但在学界，他的诗品、学品，广受称道，为人更是让人十分敬仰。

《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主编、慈溪市文联主席方向明在谈到编纪念文集初衷时说，作为诗人袁可嘉的家乡人，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影响中国新时期文学进程的大家，了解实在太少。编一本纪念文集，以这样的方式，认识这位文化大家对于中国新诗现代化、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意义，仰望一座文化高峰，这是家乡后学应该抓紧做的事情。

那么，让我们来重识一下袁可嘉，这位宁波籍的文化大家。

持法尺的九叶诗人

当时，袁家家境颇为优越，受其爱好文史和写作的大哥影响，袁可嘉从小就爱上了文学。1941年秋，他进入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就读，此时的西南联大人才济济，像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叶公超、冯至和李广田等一批名师都在此执教。

袁可嘉最直接的恩师是诗人卞之琳先生，大学二年级，袁可嘉选修了他的翻译课。袁可嘉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卞先生的场景。“当时，我把卞先生误叫作卡先生，卞先生和蔼地纠正了我这个错误。”

在西南联大，袁可嘉读的虽然是西语系，但是个十足的文学青年。他与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创办了名为《耕耘》的文学壁报。1941年7月，他正式发表第一首诗作

《死》，是为了悼念重庆大轰炸死难者而作。1943年，他的诗歌《我歌唱，在黎明金色的边缘上》被冯至看中，登载在昆明《生活周报》的副刊上，后来被香港《大公报》于1943年七七事变纪念日上转载。这首诗，也可以说是袁可嘉的成名作，其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的锐气和才华，“我们，新中国的轻骑兵，沉重地驮着世纪的灾难，等待第一声的出击！”

在西南联大，袁可嘉的兴趣从浪漫主义文学转向了现代派文学，他在联大新校舍的茅屋里先捧读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又读到了冯至的《十四行集》，与此同时更接触到美国意象派和艾略特、叶芝和奥登等人的诗作。

1946年，袁可嘉在北大西语系担任助教，给大学一年级学生上英语课，同时也迎来了诗歌创作的集中期。袁可嘉的诗作数量并不多，

一说不超过50首，另一说仅有30余首，他也是“九叶派”诗人中唯一没有出版过个人诗集。但他的每首诗都是千锤百炼、出自肺腑的心灵之作。

有学者认为，袁可嘉的诗歌“立意高远，意境空旷，而且诗韵极为精美。他的诗是现实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方法相结合的典范。”袁可嘉的诗作《沉钟》可以说最好地体现了这种风格，抒发了他对生命的沉思和人生的内省体验：

“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载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把波澜抛给大海，/把无垠还诸苍穹，/我是沉寂的洪钟，/沉寂如蓝色凝冻，//生命脱蒂于苦痛，/苦痛任死寂煎烘，/我是锈绿的洪钟，/收容八方的野风！”

在“九叶派”诗人中，袁可嘉可以说是学者型的诗人，也是“九叶派”的理论家。学者张同道曾对袁可嘉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善于思考理论问题，也善于以才华横溢的笔表达出来。当我们谈论他的诗论时，别忘记，他还是一位诗人；而当我们谈到他的诗时，更不能忽略，他是一位手持法尺的诗人。”

新时期文学的“盗火者”

还是爱尔兰叶芝的中国身份，他写给我们的是汉语，传达的却是世界的声音。”

一个好的文学翻译家应当是通晓母语和外语，熟悉中外历史文化，有较高创造才能和研究功夫的作家和学者。袁可嘉正是这样一位翻译家。

据统计，袁可嘉的翻译生涯长达50年，经其编译的译本共计20种、29册，英汉互译的零星篇章有50多篇。其中尤以对英美现代诗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为重。

2008年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举行“三十年三十本书”评选活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被评为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三十本书之一。“不仅为渴望走向世界的文学青年打开了一个第一次眺望现代西方的窗口，同时也为那个年代的一切文学创新提供了来自西方的高端范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正是袁可嘉与其他两位学者一起主编并选择的。

“文革”10年，是袁可嘉沉寂的10年。甚至，这其中的4年，袁可嘉因为莫须有的涉嫌外国间谍罪，被停止工作下放到单位打扫厕所。1979年，袁可嘉复出后，迎来了学术上的第二个春天。四册八本的《外国现

代派作品选》于1980年10月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

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中，袁可嘉除了翻译了不少现代派诗人的诗作外，还为选本写了“引言”，从宏观层面对现代派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它的思想与艺术特征，其形成的社会背景、思想根源、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了概要的阐述和精到的论评。这篇提纲挈领的“引言”其实就是如何阅读和理解现代派文学的精彩“导读”。

袁可嘉对这本书应该是满意的，他曾这样平实地说：“此书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引进了现代派文学，切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编选得较为系统，较为精当，译文质量较高，出版后有相当的影响。”

事实上，这本书是当时经历现代写作的中国作家拥抱世界文学潮流的一个最重要窗口。当代中国作家王蒙、莫言、韩少功、北岛等大都从这套书和袁可嘉的有关现代派文学的论述中得到过启发。从这一点而言，袁可嘉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盗火者”和“播火者”一点也不为过。

为什么历史在这个时刻选择了将近耳顺之年的袁可嘉？一位研究袁可嘉的学者，在他的



袁可嘉部分著作

论里以诗意的语言说道：“他有实践，有理论，又有外语这个利器。这些学术积淀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到来的春水潺潺、百鸟鸣啾的日子里，一时间成了国内那个百废待兴的荒原上的一只领头羊。”

著名文艺评论家谢冕也这样认为，20世纪80年代，袁可嘉是国内介绍外国诗歌流派最有力的一位，他几乎是一位站在新潮流前面最勇敢、最睿智的先锋性诗人和理论家。他主编的《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以及著作《现代派诗·英美诗论》，可以说“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新时代”。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桦称：袁可嘉以译介外国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方式，介入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进程之中，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间接地促动了当代文学的演变。



袁可嘉故居 (汤丹文 摄)

2015年，宁波“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将在袁可嘉的故乡崇寿镇举行，该镇也将成为宁波诗人的创作基地，进而成为“诗歌之乡”。慈溪也有意把袁可嘉诗歌奖活动办成“袁可嘉诗歌节”。作为慈溪市委文保单位的崇寿袁氏故居也保存完好，有关部门已有意向，在这里办个袁可嘉文学馆。

斯人远逝，但可嘉未曾远离，冥冥之中，他与故乡的连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30多年前，中国首届“青春诗会”，袁可嘉给当时的青年诗人讲授了欧美当代文学，如今，慈溪的女诗人张巧慧参加了第三十届“青春诗会”；来到袁可嘉故乡崇寿居住的贵州布依族小伙陈德根，在第二故乡以其诗作成为第一届《十月》青年作家奖的得主；70岁的崇寿诗人沈建基的第6本诗集《时光碎片》刚刚出版；受袁可嘉名作《沉钟》启发而命名的崇寿镇文学刊物《海塘晨钟》十分红火……

对文化大家袁可嘉而言，代表作《沉钟》写尽他的性格、他的抱负和他的命运，让人无法释怀；他是一座可以发出洪亮声音的大钟，但在风雨如晦的岁月，它只能是一座沉寂锈绿、沉默于时空的洪钟，但最后还是会“负载三千载沉重，收容八方的野风”！

一座沉寂的洪钟

重识宁波籍文化大家袁可嘉

汤丹文

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袁可嘉就是“不用外文字典的外语系高材生”，外语可算是袁可嘉的专业。专业底子深厚让袁可嘉大学毕业后就成为北大的一名助教。

1950年夏，袁可嘉从北大调离，参加中宣部组织的《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毛选》汉译英是以著名学者钱锺书为首的老一辈翻译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凝聚着当时的“小字辈”袁可嘉的一份心血。

从事《毛选》汉译英工作3年多，袁可嘉随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工作。1958年，袁可嘉到农村接受劳动锻炼，有感于当时的环境与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故乡很吻合，就从牛津版的《彭斯诗选》中选译了70首，编成《彭斯诗钞》，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时，中国诗界正兴起向民间歌谣学习的热潮，袁可嘉的译本也成为向彭斯诞辰200周年的献礼之作。1986年袁可嘉访问英国，还受到彭斯故乡人民的热情接待，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过：“诗在翻译中丢失”，但袁可嘉译诗似乎丢失得很少。他说：“翻译诗歌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传达方式，而是一种不完美的传达方式而已。”

如今的文学爱好者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对叶芝那首《茵纳斯弗利岛》的翻译：“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巢/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学者阿西如此感叹道：“这是陶渊明今天在说话吗？”

在漫画家高莽的笔下，袁可嘉是个“有着圆圆的大脑袋和闪烁智慧的宽阔额头的慈祥老人”。在现实生活中，袁可嘉衣着朴素，没有架子，始终保持微笑，的确很低调。他带的第一届博士生、学者傅浩甚至这样说说他眼中的“先生”：“先生不事张扬，谦逊得让人失望”。

其实，作为诗人的袁可嘉有一颗滚烫而火热的心。2000年12月，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原计划为庆祝卞之琳九十华诞举行专题研讨会。在全家人反对的情形下，80岁高龄的袁可嘉抱病从纽约赶来，为的是要跟60年交往的老师见个面。下飞机当日，听到的却是老师仙逝的噩耗。这使他极为悲痛，庆生会成了追思会，“老学生”袁可嘉头个发言，几度哽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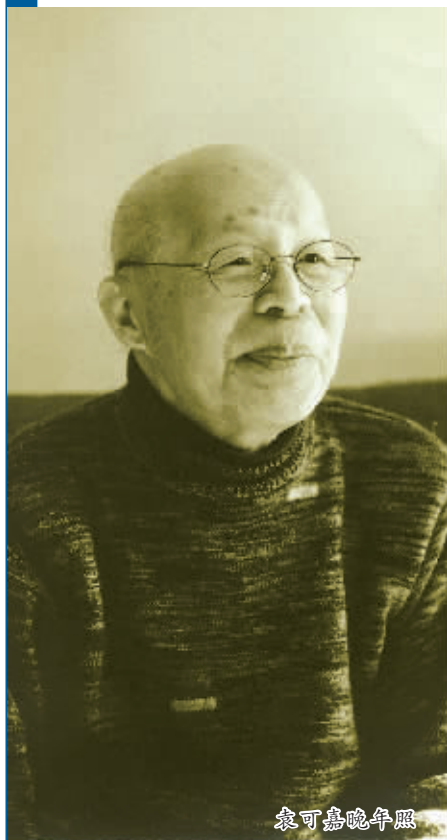
长期研究慈溪地方文化的学者童银舫，是与袁可嘉过往最为密切的慈溪老乡之一，更是感受到了他热爱家乡、提携后辈的赤子之心。1983年，当童银舫得知袁可嘉是慈溪人时，就写了封信向他求救，没想到9月就收到了他的来信。随后，童银舫请他写了篇回忆家乡的文章，连同他写的《袁可嘉小传》一起编发在当时的《慈溪文艺》上。

1985年，童银舫与慈溪几个文学青年发起成立一个诗社，受《九叶集》启发，取名为“七叶诗社”，并聘请袁可嘉作了名誉社长，袁可嘉立即写信表示祝贺。此后，书信来往不断，而当时袁可嘉已是外文所的博士生导师了，但他仍与慈溪的文学青年进行着频繁交流，对慈溪诗人的诗作进行具体的点评和指导。1994年，童银舫出版了个人诗集《童心诗选》。“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本诗选极其幼稚，但袁先生还是写来了一封长信，除了鼓励外，还细心地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比如：一首成功之作，必须有虚有实，太实了，引不起共鸣，太虚了，让人抓不住要领。”袁可嘉

还希望童银舫在今后的创作中，“要像诗人里尔克所说那样，要耐心领悟，耐心等待。他等了十年，才写成《给奥尔夫斯的十四行诗》，真不简单啊。”

慈溪诗人俞强同样也得到过袁可嘉的教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袁可嘉相识后，至2001年，两人书信往来有50多封，让俞强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怎样做人上都得到了不少教益。1999年10月，俞强的第一本诗集《食指和拇指》即将出版，约请老人作序。当年10月，在慈溪日报社工作的俞强收到了一封厚厚的航空信，这是晚年与女儿一起住在美国的袁可嘉所寄。信封里面是长达11页的文稿，用蓝色圆珠笔工工整整地誊抄在方格纸内。这篇题为《诗贵升平》的序言约5000字，是序言，更是诗论，它是久病缠身的袁可嘉花了4个月的功夫，陆续续艰难写就。“常常写了几句，又因脑缺氧，手中的笔掉在地上，坐在桌前昏睡过去”。袁可嘉的女儿袁晓敏这样回忆当时的父亲。当她让老爸身体恢复后再写时，袁可嘉对袁晓敏说：“我年轻时也是靠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前辈提携才出道的，俞强是一位很有潜力、有前途的诗人，我要扶他一把。”这让俞强激动不已。序言中，袁可嘉向故乡这位很有前途很有潜力的诗人作了这样的文学交代：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写出更有分量，更能反映时代特色和人民心声的大作品。

1994年11月中旬，袁可嘉曾回家探



袁可嘉晚年照